

目 录

发刊词·····	廖盖隆 (1)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4)
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	赵 镠 (18)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	廖盖隆 (29)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记陈云同志主持的	
“七道江会议”前后·····	彭嘉庆 (48)
我的回忆·····	王维舟 (69)
一、幼年时期·····	(70)
二、三年学徒·····	(71)
三、辛亥革命与光复川东绥定、	
东乡地区前后·····	(72)
四、护国之役·····	(78)
五、在川东时期的旧军队生活·····	(79)
六、寻求真理，加入朝鲜共产党·····	(82)
七、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85)
八、“赤心社”与“俄灾救济会”的活动·····	(86)
九、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大革命的斗争·····	(87)

十、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88)
十一、红三十三军的成立及川陕边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7)
十二、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 长征到陕北·····	(101)
十三、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	(106)
十四、陇东十年·····	(107)
十五、解放战争时期·····	(110)
十六、伟大的十年·····	(112)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114)
一、青少年时期和家庭·····	(114)
二、走上革命道路·····	(119)
三、在苏联的五年半·····	(130)
四、回国前后·····	(149)
五、在中央苏区·····	(154)
六、为李德作翻译·····	(167)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孙冶方	(180)
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高文华	(184)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刘培植	(189)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经过 ·····胡 琦 何华生 许明修	(211)
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 的地位·····罗征敬	(224)

参考资料摘登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238)

参考资料选译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摘译

.....美籍华人郭成棠 (256)

一、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 (256)

二、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点 (288)

发 刊 词

廖 盖 隆

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编辑出版过丛刊性质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现在这个刊物——《中共党史资料》，是根据冯文彬同志的提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内部刊物呢？这是为了满足研究和编写党史的需要，而且是紧迫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党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胜利的道路。尽管党犯过不少错误，经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但总的说来，党的工作有了伟大的成绩，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回顾党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总结党的丰富历史经验，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地去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有力推动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的一个讲话中就说过：“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又指出，搞清党史，“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

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是，从毛泽东同志那次讲话至今，又过去了将近四十年，我们还没有编出一部党史。

正是鉴于编写党史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紧迫的任务，一九八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九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研究和编写党史的专门机构。一九八〇年五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征集党史资料。这样，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史研究、编写工作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

要研究和编写党史，首先必须搜集、核实和整理党史资料，陈云同志在两年前就说过，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因为只有在掌握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党的历史的全过程，才能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才能编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党史资料从内容来说，包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决策、执行政策的过程的材料，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敌人的材料，以及作为党史的背景、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材料等等。但是，就材料的类别来说，无非是已经见诸文字的书面材料，以及保存在年事已高的有丰富的革命阅历的老同志的头脑中的“活材料”。收集文献资料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还

要花很大力量。但抢救“活材料”的任务更为紧迫。因为从党的创立时期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健在的只有一万八千多人了，而这些老同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做过重要负责工作和革命阅历丰富的，他们大多数已年老体弱，对他们脑子里的“活材料”，再不发动一个“抢救运动”确实不行了。党的长远利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代的利益，迫切地要求这些老同志抓紧时间撰写或向别人口述回忆录。胡耀邦同志说：“要奉劝老同志晚年写回忆录，不要留恋安排一个职位。这两者相比，前者对革命、对后代子孙的意义比后者大得多。”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写革命回忆录的号召，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重视，许多同志写出了实事求是的、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回忆录。

《中共党史资料》这个刊物将以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老同志撰写或口述的回忆录，并发表一些党外人士撰写或口述的有关党史的回忆录。同时，将发表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献资料；译载或选载国外或台港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转载或摘录转载报刊上已经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的党史资料；还将发表经过党史工作者综合整理的党史资料，以及对党史上的重要事实提出修正或进行讨论的来信来稿。

《中共党史资料》是为全体党史工作者、党史的喜好者以及全体党员、干部办的，它只有得到革命老前辈和全党的大力支持才能办好。我们这个刊物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热烈地欢迎同志们踊跃来稿来信，提出批评建议！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一九四六年九月）

〔编者按：本文在刊出前，经邓颖超同志重新审定，并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

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病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

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

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〇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

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 * *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茎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

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

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作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它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〇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

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 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

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 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 * *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

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十五师，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

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即离开南征军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时，我曾去过一次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